

中亚与西北边疆研究丛书



从“民主岛”到 “郁金香革命”：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

焦一强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从“民主岛”到 “郁金香革命”：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

焦一强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民主岛”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焦一强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0. 8

(中亚与西北边疆研究系列/汪金国主编)

ISBN 978-7-311-03583-9

I. ①从… II. ①焦… III. ①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吉尔吉斯斯坦 IV. ①D7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1939 号

责任编辑 刘 琦

封面设计 张友乾

书 名 从“民主岛”到“郁金香革命”: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

作 者 焦一强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残联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20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09 千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583-9

定 价 32.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前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从南欧到拉美,再到东亚,最后是苏东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股具有全球性意义的、被亨廷顿称为“第三波”的民主化改革浪潮,从而开启了上述地区国家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全面的社会转型。显然,就上述广大地区的社会转型而言,当数前苏东地区的转型最为引人注目。其中,尤以该地区的政治转型为甚,原因是前苏东国家不同于上述其他三个地区的国家,其政治转型不仅是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的简单变迁,而且国家的“颜色”发生了变化,即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原来的社会主义转向了资本主义。前苏联中亚地区新独立国家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转型正是在上述这一广阔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整个转型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研究中亚基本上是以地区为对象,而缺乏对地区单个国家具体情况作深入仔细的研究。以政治转型为例,即便是在现有的相关中亚地区政治转型研究十分有限的科研成果中,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也往往是比较笼统。如在中亚各国政治体制转型的路径依赖或模式描述上,所得出的结论就比较宽泛:要么是总统集权制,要么是权威主义。事实上,就权威主义统治状况而言,吉尔吉斯斯坦与其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不可等量齐观的。

作为个案,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在后苏联空间的特征表现极具戏剧性色彩。由中亚“民主岛”的狂热追求到“郁金香革命”的骤然发生,由奉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圭臬到集权政体的回归,由对外来文明的盲目模仿到因制度“叠合”的无效性而陷入“民主—专制”的怪圈,由多次修宪到至今尚未厘清“总统制”与“议会制”而塑造了一个模糊不清的脆弱的政权体系,凡此等等,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所表现出的大起大落、摇摆不定等现象在后苏联转型国家中并不多见。尽管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国在特定时期上述特征有某种程度的表现,但是吉尔吉斯斯坦有自己的特色。

综上所述,为了解读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全貌,本书所要探究和解决的

主要问题是：促使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动因究竟何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制度建构的状况及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以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转型反而落得权威主义的结局；“郁金香革命”是否意味着“第二次转型”的成功；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有何特征；影响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基本因素有哪些；如何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民主化转型的绩效；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轨实践的悖论对中国的警示意义和启示作用又是什么。本书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指导思想，同时批判地吸收并借鉴当代西方政治转型理论，运用比较分析法、系统综合分析法、文献解读法以及定量分析法等理论分析工具尝试着对上述问题作出解答。

本书的内容分为导论、第一章至第八章。

本书的导论主要阐述了研究的缘起及选题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研究的思路框架和分析工具以及研究课题的新意等。

第一章主要分析了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历史背景与动因。把吉国政治转型置于其独立前社会状况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并以苏联解体为视角探究转型的动因，不仅是本书研究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理解吉国整个转型过程的基础。

第二章根据相关政治转型阶段划分理论来探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启动。其中，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作为加盟共和国的政治改革标志着吉国政治转型的正式启动，独立国家身份的确立是吉国政治转型的基本前提之一。

第三章通过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进程的总体把握与描述来分析其基本政治制度的构建状况。首先，宪政改革是任何体制转型的关键。关于国家体制与发展模式的探索不但为新独立的吉尔吉斯斯坦指明了国家发展的方向，而且更重要的是为首部宪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其次，以宪政为视角对首部宪法进行了分析。最后，分别对吉尔吉斯斯坦转型期间的立法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状况及所面临的问题作了极为详尽的分析。上述有关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建构状况的阐释，为后来对其政治转型特征进行理论抽象与概括并对相关问题作出评价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着重分析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集权制政体的确立与巩固，并对该权威主义政体所造成的影响给予了评价。总统集权制是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模式选择的结果，它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生态相匹配。转型期总统权威虽说一时能够起到稳定秩序的作用，但却难以成就永久的合法性。

第五章主要是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过程中的“郁金香革命”进行分析。除对吉国“郁金香革命”的性质及原因进行探究之外，还以“第二次转型”为分析范式对该事件后吉国政治发展的状况作了评价。

第六章是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特征的评析。结合此前相关章节对吉尔

吉斯斯坦十多年政治转型历程的宏观描述与分析,对其政治转型的特征及规律进行理论抽象。本章从五个方面总结出了吉尔吉斯斯坦以下政治转型特征。“激烈—缓和—激烈”的转型进程;“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权力格局;政治转型与民族国家建构同步进行;政治运作非制度化;困扰政治转型的痼疾;不断的宪政危机: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

第七章以社会经济、传统政治文化、民族宗教和外部环境为视角,对影响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是一系列内外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而言,经济因素无疑是吉国政治转型的基本动因;传统政治文化是吉国民主化政治转型中出现恶质因素、政治运作非制度化的重要动因;民族关系和宗教极端势力是影响吉国政治转型所需和谐稳定环境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的又一重要因素;吉国政治转型陷入盲目模仿及摇摆不定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势力的影响有关。

第八章通过对吉尔吉斯斯坦民主化政治转型绩效的总结与评价,得出了本书研究的六点结论,同时也就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实践的悖论给予中国的启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历史背景与动因	23
第一节 政治转型的历史背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前社会状况的简单回顾	24
第二节 动因分析:以苏联解体为视角	31
第二章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启动	47
第一节 政治转型的启动:作为加盟共和国的政治改革	47
第二节 独立国家身份的确立	56
第三章 政治转型演进与新政治制度的构建	64
第一节 “民主岛”与“中亚瑞士”:国家体制与发展模式的定位	64
第二节 1993年宪法:宪政民主制度的确立	68
第三节 立法机构的重建与改革	73
第四节 司法制度改革及其所面临的问题	84
第五节 “多党性”而非“多党制”:转型期的政党格局	92
第四章 回归权威:总统集权制之分析纬度	109
第一节 总统集权制政体的确立与巩固	109
第二节 对总统集权制的评价	125
第五章 “郁金香革命”:不成功的“第二次转型”	129
第一节 是“革命”还是“政变”:“颜色革命”的理论解析	129
第二节 “郁金香革命”的过程	140
第三节 “郁金香革命”的原因分析	142
第四节 “郁金香革命”:不成功的“第二次转型”	158
第六章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特征评析	164
第一节 “激烈—缓和—激烈”的转型进程	164
第二节 “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权力格局	171

第三节	政治转型与民族国家建构同步进行·····	173
第四节	政治运作非制度化：困扰政治转型的痼疾·····	177
第五节	不断的宪政危机：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	183
第七章	影响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因素分析·····	187
第一节	社会经济因素·····	188
第二节	传统政治文化因素·····	201
第三节	民族关系因素·····	215
第四节	宗教极端势力因素·····	218
第五节	外部势力因素·····	221
第八章	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实践的悖论 及其启示·····	237
第一节	从“民主岛”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民主之路依然 任重而道远·····	237
第二节	傲慢与局限：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 实践的悖论给予中国的启示·····	241
参考文献	·····	247
后记	·····	261

导 论

一、研究的缘起及选题的意义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先是在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紧接着在拉美,继而是东亚,最后到苏东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股具有全球性意义的、也就是亨廷顿所称的“第三波”民主化改革浪潮,从而开启了上述地区的国家以制度变迁为核心内容的全面的社会转型。^① 在发生在上述地区的制度与社会变迁中,当推前苏东地区的转型最为引人注目。显然,就政治转型而言,前苏东国家不同于上述其他三个地区的国家,因为其政治转型不单单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的简单变迁,而且国家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即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原来的社会主义转为资本主义。前苏联中亚地区新独立国家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转型正是在上述这一广阔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社会转型是最近大约 20 年来国际学术界新兴的一个学科知识领域。^② 尽管转型是一个涉及研究领域十分宏大的命题,然而,就目前研究的热点来看,如何通过制度变迁所发生的各个领域的考察与描述,来看待各国转型过程或模式,并对其作出一个阶段性的结论与评价,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核心研究课题。其中,相关转型模式的同一性、普适性和本土性、独特性问题尤能引起学者的研究旨趣,同一性与多样性并存是目前学者们对转型研究所作出的最为醒目的结论之一。关于这一点,国内外学术界在某种程度上已达成了一定共识。冯绍雷教授认为:“转型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广泛的历史进程,又具有复杂多样的路径依赖,形成各不相同的战略选择,并表现为尚未终了的、面貌各异并日益被制度化了的转型结果。转型过程不仅是内在

^① 参见冯绍雷:《原苏东、南欧、拉美与东亚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8 期。

^② 参见冯绍雷:《制度转型与范式转换——以俄罗斯的体制转型为例》,载于冯绍雷、相蓝欣的《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总论”第 1 页。

统一的、相似的,而且是多样化的;转型的实质不仅在于其普遍性,还在于其各自不同的独特性。”^①丹麦学者奥勒·诺格德也曾指出:“显而易见的是,并不存在某种‘放之四海皆真理’的普适化转型模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这些独特性因素有助于塑造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似乎不可避免的制度变革。”^②日本著名转型理论家青木昌彦也曾说过:“我们将看到全球性制度安排的双重趋势:一方面是跨国家制度的重要性上升;另一方面是地域性国家和地方制度多样性的持续深化。”^③作为上述地区,尤其是前苏东地区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转型也不例外,即其转型同样体现了同一性与多样性的内在关联和统一。其中,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谓是吉尔吉斯斯坦社会转型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内容。

以前苏东地区政治转型为视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与其他前苏东国家在路径切入和选择以及发展模式上存在的相似性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苏联解体是所有前苏东国家政治转型的基本历史前提,其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安排均脱胎于前苏联体制的遗产,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其转型启动的动因基础。从总的发展脉络来看,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治的演变历程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也表现为以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政治模式取代苏联一党专政的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模式的过程。民主的发展方向及相关宪政制度安排,如三权分立、多党制、普选制、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独立开放的市民社会等西方民主政治所必需的法律形式已通过国家根本大法——宪法基本确立。

然而,与大多后苏联国家一样,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绝非一部宪法就能解决问题,其转型的绩效与制度构建状况的差异性同样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一直是漫长的游牧社会,传统社会根基极其深厚,部族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加之阿拉伯帝国、俄罗斯帝国等外来势力的入侵以及前苏联的长期统治,致使吉国缺乏自己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其传统政治文化更多的是以政治亚文化的表现形式而存在,因此,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转型历程显得极其艰难而复杂:现代性与传统性、西方化与本土化,既相融共生,又相互排斥和博弈,从而对其政治转轨进程产生了无尽影响。有俄罗斯学者指出:“当代民主转型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说在最终都建立了巩固的民主制度,反而是民主制度常常遭遇停滞,甚至是导致在伪民主花言巧语修饰下的权威主义秩序的复归,后苏联国家的

^①参见奥勒·诺格德:《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中译本序,孙友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V页。

^②参见奥勒·诺格德:《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中译本序,孙友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VI页。

^③[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392页。

情形就是这样。”^①应该说,后苏联时期的吉尔吉斯斯坦可谓是此类案例的典型,十多年的转型非但没有造就政治精英们当初所憧憬的真正的民主和法制国家,反而在转型过程中,既非复归传统制度,亦非走向既定目标。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前,吉尔吉斯斯坦一直躲在历史神秘面纱之后,鲜为外部世界所知。然而,2005年一场“郁金香革命”^②和2010年的政变使吉尔吉斯斯坦一下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独立初期对中亚“民主岛”的狂热追求,到2005年“郁金香革命”的骤然发生,从阿卡耶夫总统因对民主津津乐道而被西方赞誉为“中亚民主战士”,到其一夜之间被赶下台而被迫流亡异国他乡,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神话顷刻破灭……人们不禁要问:吉尔吉斯斯坦到底怎么了?!客观而论,“郁金香革命”可谓是吉尔吉斯斯坦十余年政治转型的一次总检阅,同时也给本书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1月至2008年1月,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笔者作为普通访问学者,在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俄罗斯斯拉夫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在此期间,除与当地一些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外,体察吉国社情亦给本课题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吉国独立后因失去了前苏联时期国家对科研的投入,科研状况十分落后,图书资料也比较匮乏,即便如此,笔者还是克服重重困难,收集到了第一手宝贵资料,从而奠定了本书研究的基础。

综上所述,本书研究的缘起主要是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 研究的现实意义

本书研究的现实意义主要基于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中亚独特地缘战略地位对中国的重要性考量。而此种考虑的缘由是,中国是中亚的近邻,且不说别的,单就中国西部边陲地区的安全及西部大开发战略而言,其现实意义之重大便显而易见。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亚五国的历史是一个地区的历史,而不是五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历史。^③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接合部,同时也是连接东西方交通的要道。

^①См.: Мельвиль А Ю. Опыт теоритико –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интеза структурного и процедурного подходов к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м транзита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8. № 2.

^②所谓“颜色革命”,是对一些独联体国家议会或总统选举过程中发生的政权更迭方式的称谓。在这些国家,由于游行示威者头上或胳膊上戴着与其国家盛产的鲜花颜色相同的丝巾或标志,因此人们将在野的反对派通过组织群众示威游行而取得政权的行为称为“颜色革命”。格鲁吉亚的为“玫瑰革命”,乌克兰的为“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为“郁金香革命”。参见潘德礼主编:《俄罗斯东欧中亚政治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5页。有关“颜色革命”及吉国的“郁金香革命”,本书第五章将有详细论述。

^③[美]胡曼·佩马尼:《虎视中亚》,王振西主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古代的“丝绸之路”和当代的“欧亚大陆桥”都从这里经过。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中亚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正因为如此,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视中亚为“欧亚大陆的心脏”。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的独立极大地改变了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版图,使地区地缘政治意义再度凸现。另外,加之该地区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号称“第二个波斯湾”的里海油气资源的发现,使中亚更加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从而使得其成为各种大国外部势力的利益交汇点和外交角逐的重大场所。

除全球视阈中的中亚备受外部势力和相关大国高度关注外,就地区层面而言,中亚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尤其是安全合作与西部大开发,意义无疑是举足轻重的。五国中的三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中国有着3300多千米的共同边界(中吉边界858千米);四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亚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交往和渊源,我国西北部,尤其是新疆地区有不少民族与中亚邻国相应的民族同属跨界民族,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有极为相似之处。虽说本书的论题是中亚五国之一的吉尔吉斯斯坦,但由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五国在语言和宗教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着一致性,加之又同属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相同的经历和社会状况将五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见,笔者在此较多地介绍中亚并非与本书的论题毫无关系,何况中国在制定中亚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地区层面。

尽管在中国西部战略利益棋盘上,中亚常常是以整个地区形象出现而备受关注的,但作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吉尔吉斯斯坦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尤其是国家安全方面对中国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就地缘政治来看,吉尔吉斯斯坦虽说是一个面积不足20万平方千米、人口只有500多万的中亚山地小国,但却是外部势力大国比较看重并积极介入的一个国家。比如,吉尔吉斯斯坦不但拥有地区最多的国外非政府组织,而且还曾是中亚国家中唯一一个美俄都建有军事基地的国家。以美俄两国建有军事基地的首都比什凯克为例,距离阿富汗才643千米,距哈萨克斯坦仅32千米,距中国只有321千米。另外,中吉两国人民的历史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中国新疆境内的十多万柯尔克孜族(吉尔吉斯族在中国的别称)与吉国的主体民族吉尔吉斯族同宗同源,在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方面完全相同。这是加强中吉两国睦邻友好关系与政治互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有利因素。

其次,就地缘经济而言,吉国虽说是中亚地区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经济存量十分有限,加之自然资源禀赋较差,客观上讲,中吉双方的经济合作潜力远不如哈乌等地区大国;但中吉两国的优势是,双方同属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加

之陆上口岸的便利条件,吉国近几年来一直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已从1992年的0.36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2.3亿美元。^①此外,中吉双方还就修筑两国跨国铁路以便辐射整个中亚地区达成协议,这对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无疑具有更大的拉动作用。

最后,就安全方面而言,反恐领域的合作是中吉合作的亮点,其重大意义应该说要远远超过两国在包括经济合作在内的其他领域的合作。冷战后,中亚地区成为当今世界安全的一个脆弱地带。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处的费尔干纳盆地是当今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滋生、活跃的地带,吉国南部就靠近该地带。由于“三股恶势力”(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兴风作浪,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西部边疆的和平稳定。2002年10月,中吉双方举行了首次反恐联合军事演习,此后,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安全合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态势,这对保持西部安宁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中亚的地缘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安全形势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同时也有挑战。因此,加强与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的睦邻友好与合作关系,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完全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选择吉尔吉斯斯坦作为研究的对象,笔者认为其理论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有助于推动我国“当代中亚学”学科建设的丰富与发展。“当代中亚学”概念是由我国研究中亚问题著名专家赵常庆首次提出的。从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出发,他对“当代中亚学”的基本界定是:当代中亚学是以中亚地区和位于该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五国为基本研究对象,侧重于对该地区和五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对外关系进行综合与国别研究,因此,属于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际关系三个二级学科的研究范畴。世界上对“中亚”的涵盖面理解不同,中国学术界通常把“当代中亚”界定为上述五国。^②“当代中亚学”在我国尚属一门年轻的学科。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及中亚五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出现,一门新的学科——“当代中亚学”在我国学术界盛行起来。在接下来的近20年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历程中,中亚研究一直备受我国学术界高度关注,且时至今日依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多年来,广大理论工作者从多维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入仔细的探

^①王海燕:《中国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载于《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7年第9期。

^②参见赵常庆:《中国“当代中亚学”的形成与现状》,载于《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4期。

讨和研究,著述甚丰,研究成果也颇多,目前,新的论著依然层出不穷。纵观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单就研究的内容来看,政治、经济、对外政策、民族、宗教、社会转型等均有涉猎。然而,遗憾的是,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在现有的著述中,不管内容如何,几乎所有著者都是以整个中亚地区作为其研究对象的,而很少有学者对地区具体国别进行研究,致使中亚国别研究成果十分贫乏。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因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的贫困、资金不足而影响到学术研究的因素,也受我国学者因赴中亚考察交流的机会少而难以收集到第一手资料的客观条件所限。当然,笔者绝非厚此薄彼,因为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各有千秋,两者是整体与部分,或者说是“面”与“点”的关系,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在中亚地区层面上进行研究,其优点在于可以通过把握总体来获得全面的认识和结论,但不足之处是易导致泛泛而论,大而化之,最终因缺乏细化研究而影响到总体认识的质量。在这方面,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的政局变化可为一例。国内不少有关中亚政治形势的著述中对中亚独立以来政局走势所作的总体判断是除塔吉克内战外是平稳的,但2005年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曾波及乌兹别克斯坦,并对该国“安集延事件”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述两大事件曾一度影响到了中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表面上看,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是偶发事件,但若对吉国独立以来的社会现状和政治生态进行细究,该事件的发生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中亚国家虽说有其地区发展的一般特征,但毕竟各国独立后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尽相同,并且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之后形成了各自的发展模式和特色。做到“点”“面”结合不失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点”的研究越是细致入微,就越有利于从“面”上进行宏观把握,进而有利于提高对事物进行整体把握和判断的准确性。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在我国学术界,有关中亚具体国别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至于对地区国别政治转型的研究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有关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目前尚无专著问世,论文也不多见,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基于上述考虑,选择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中亚区域的一个案例研究,对促进中亚研究、丰富我国“当代中亚学”的理论宝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对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政治变迁的重大实践活动进行理论上的反思与总结,目的是揭示其政治转型的内在规律及特殊性。纵观吉尔吉斯斯坦十余年的政治转型历程,可谓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由中亚“民主岛”或“中亚瑞士”的理想追求到“郁金香革命”民主神话的破灭,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轨的大起大落充满了极大的变数,不由得引发了人们对当代政治转轨理论的反思。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当代政治转型理论所涉猎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以区域为载体,

在方法论上更是过分地注重通过比较研究来提炼有价值的理论与规律,而缺乏对单独国别这一“特殊客体”的具体国情及其所处政治环境的详尽分析,以至于对政治转轨过程中新出现的一些政治现象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进而不但影响到了对区域政治形势的总体把握和预测,而且亦使政治转型理论难免带有某种缺陷。在这方面,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转型不失为一个特殊案例。笔者研究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其自身的独特性。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在中亚,乃至在独联体国家,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政治转型像吉尔吉斯斯坦那样因缺乏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而显得游离多变,又因盲目模仿他国的转型模式而导致其政治转型表现得摇摆不定。立国伊始,吉尔吉斯斯坦鉴于本国资源贫乏,一时难以找到发展的支撑点,便把目光投向西方,寄希望于中亚“民主岛”来吸引外援;当西方的民主制度与吉国政治环境不适并引发一系列国内问题时,受其中亚邻国及俄罗斯的影响,吉国统治模式也开始回归权威,国家权力结构逐渐适应了总统专制的模式。客观地讲,权威统治固然能起到稳固秩序的作用,但却难以成就永久的合法性。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反对阿卡耶夫权威统治似乎成了吉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从吉国常为街头政治困扰、频频修宪、政治危机不断、政局时常不稳等一系列政治形势中均可得到清晰的反映。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模式与后苏联很多国家一样,具有“混合体制”的特点,即既有形式上的民主成分,同时又不乏集权和专制的色彩,也就是说,其政治转型陷入了“民主—专制”的怪圈。至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政体形式,更是模糊不清,随着宪政制度的反复多变,吉国政体形式究竟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抑或是总统一议会制,连吉国内学者也难以说清。^①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特点,是由其特殊的国情、传统政治文化、多元平衡对外政策等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关于这点在本书第五、第六章里将有详尽的分析。总而言之,通过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特征和规律从理论高度上进行把握和提炼,不仅能为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吉国的政治转型及其与中亚地区乃至独联体其他国家政治转型的差异,提供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对吉国乃至中亚地区政局走势的进一步深入把握和准确预测。

鉴于权威主义是本书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析向度,故在此对权威主义的内涵

^①笔者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学术访问期间,曾就此问题与诸多当地学者进行过交流,除说法各异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目前的政体是一种难以说清的混合形式。

及与此相关的权威主义政体^①从理论上进行一定程度的阐释是极为必要的。何况有学者指出，“对民主化原因的研究必然首先从对非民主政权的研究开始”，因为，“在向民主化转型的政权中，权威主义国家占了相当重要的比例”。^②事实上，关于威权政体及其转型的研究是20世纪下半叶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流。^③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权威主义的概念，国内外学术界至今尚无统一定论。

“权威主义”即权威政治，也称“威权主义”，英文是“authoritarianism”。据说权威主义概念是由西方学者沃格林于20世纪30年代最先提出的。^④此后，有不少学者相继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对权威主义的理解和阐述，如美国学者胡安·林兹、珀尔玛特、亨廷顿等，南美学者奥唐奈尔以及中国学者罗荣渠等。除此之外，西方一些有名的工具类辞书也对权威主义进行了解释。

《美国政治学词典》对权威主义的定义是：“政治权威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小集团手中，它强调统治者对普通民众的绝对权力以及普通民众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而个人权利和自由则从属于国家。”^⑤《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将权威主义定义为：“一种统治形式，或者拥护这种形式的哲学。在这种统治形式下，统治者把他们的价值观强加给社会。……这一术语意味着一系列为数众多的政府体制，它包括专制政治、暴政、法西斯主义、纳粹以及极权主义。”^⑥而《剑桥百科全书》则认为：“权威主义是指一种相对于民主制的政府形式或者理论。它并不强调社会对其统治者及其决定的认可。……权威主义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基于胁迫。”^⑦在亨廷顿看来，一党体制、极权体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等都属于权威主义不民主政体。^⑧哈耶克在其《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曾指出：“对于民主政制而言，它的对立面是权威政府，而对于自由主义来讲，它的对立面则是全权主义。”^⑨阿根廷学者奥唐奈尔通过对拉美政治变革的考察，提出了官僚权威

①西方学者一般把政治制度分为三大类，即民主政体、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其中权威主义政体还有诸如“威权主义”和“威权政治”等多种称法。该观点可参见王孝勇的《权威主义政体：概念、特征和类型》一文，载于《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因此，本书在不作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权威主义”可与“权威主义政体”混用。

②参见陈尧：《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③孙代尧：《现代化进程中的威权政治——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式述评》，载于《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

④参见陈峰君：《威权主义概念与成因》，载于《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4期。

⑤Jack C. Plano and Milton Greenberg, *The American Political Dictionary* (7th edition), Holt Rinehart and Wiston, 1985.

⑥转引自陈尧：《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⑦转引自王明芳：《权威主义政治文化与德国国家性格的改变》，载于《欧洲》2005年第6期。

⑧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页。

⑨〔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6页。

主义理论以概括该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体制。中国学者罗荣渠教授认为：“所谓权威主义政权，是指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军人政权或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①孙代尧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威权政体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介于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较温和的专制政体”的观点。^②

综合上述分析，由于权威主义的含义不尽相同，曾有学者将其集中概括为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权威主义政体的广义、狭义两种概念的共性在于都强调权威主义政体的非民主性，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狭义权威主义政体概念更赋予了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内涵。^③在笔者看来，亨廷顿和孙代尧的观点可谓是分别代表了广义和狭义这两种情况。本书采用狭义的权威主义观，即主要研究的是伴随着苏东剧变而开启的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进程中所出现的权威主义政治现象；而在对吉国权威主义政体的总体判断上，笔者比较认同孙代尧的看法，即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权威主义政体是介于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较温和的专制政体。

除权威主义之外，在分析范式方面，本书在研究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时引入了“第二次转型”的理论范畴。客观地讲，目前学术界关于“颜色革命”是否意味着后苏联国家“第二次转型”的提法并不十分普遍，仅仅有极个别西方学者和观察家在看到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政局动荡后便认为，欧亚地区的“后苏联国家”开始了新一轮政治转型。^④况且如同本书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是有一定区别的。至于“郁金香革命”是否标志着吉国“第二次转型”的提法更是罕见。事实上，“第二次转型”这一学术概念本身目前尚无定论，也没有在学术界流行起来。相比较而言，有关普京时代俄罗斯“第二次转型”的说法倒是有一定程度的反映。我国有学者在研究后叶利钦时代俄罗斯重新崛起时将“第二次转型”界定为：“其核心内容是在完成制度转型基本任务的基础上通过新一轮转型克服原有转型的‘制度陷阱’，使已经构建的制度从非效率制度均衡向效率制度均衡转变。”^⑤就这一意义而言，单从“郁金香革命”前后吉国一直处于总统制与议会制的无休止争论以及其政权体系尚未达到相对稳固的质的状态这一情况来看，其

①罗荣渠：《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②孙代尧：《威权政体及其转型：理论模型和研究途径》，载于《文史哲》2003年第5期。

③参见王孝勇：《权威主义政体：概念、特征和类型》，载于《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④参见〔德〕乌韦·哈尔巴赫、〔奥地利〕弗朗茨·埃德：《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更迭和独联体内部的政权颠覆恐惧》，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

⑤参见杨成：《“第二次转型”与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华东师范大学2008届博士论文。